

古代文史
名著选译丛书

先秦两汉

己酉年秋

译注 李国祥 等

审阅 许嘉璐

后汉书选译

古代
文学
名著
★

后汉书选译

译注

李国祥 杨昶 彭益林

审阅

许嘉璐

巴蜀书社

一九九〇年·成都

责任编辑：梅锦辉

封面题签：启 功

封面设计：陈世五

技术设计：盛寄萍

插 图：张修竹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后 汉 书 选 译

李国祥 杨昶 彭益林 译注

巴蜀书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06毫米1/32

印张12.375 字数180千

1990年6月第一版

1991年1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15,000—65,000册

ISBN7-80523-375-8/Z·27

定 价：140.00元 (50种)



序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丛书编委会的同志与众多专家学者通力协作、辛勤耕耘的结果。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的岁月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今天，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學理论为指导，整理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做到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人们在正确认识民族历史的同时，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使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得以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而要做到这样，对古籍进行整理与研究是重要的基础工

程。但是，整理与研究古籍仅作标点、校勘、注释、辑佚还不够，还要有今译，使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愿意去读，都能读懂，以便从中得到教益。

基于以上认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于一九八六年五月组成了以章培恒、马樟根、安平秋三位同志为主编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确定了以全国十八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为主力承担这一看似轻易、实则艰巨的今译任务。在第一次编委会议上，拟定了《凡例》、《编写与审稿要求》、《文稿书写格式》和一百余种书目。以每一种书为十万至十五万字计算，这套丛书大约有一千余万字，应该说是一项大工程。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了第一批三十六部书稿的译注任务。在各研究所的专家与所长把关的基础上，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和七月，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召开了部分编委参加的审稿会，通过了二十五部书稿，作为《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的第一批作品。与此同时，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邀请了在京的十几位专家教授与编委会十几位编委一起座谈这套丛书与古籍今译的问题。专家们肯定了今译工作的必要性与深远意义，并以他们数十年的教学科研和创作的经验，说明今译是一项

难度很大的工作，是培养人才，使之打下坚实基础的一种有效方法，专家们还对《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这对当时的审稿工作和保证《丛书》的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实践证明，古籍的今注不易，今译更难。没有对作品的深入、透彻的研究，没有准确、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想做好今译是不可能的。两年多来，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在探索古籍的今注、今译的道路上，做了一些工作。这部丛书的出版，是系统今译的开始，说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更可喜的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参加了今注今译工作，为古籍整理增添了新生力量，相信他们会在实践中，在学习，中成长成熟。我希望，这套丛书的编委会和高校各古籍整理研究所要敞开大门，加强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联系，征求他们和广大读者的意见，并向有真才实学而又适宜做今译工作的专家学者约稿，以提高古籍译注的水平，使《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的第二批、第三批作品的质量更上一层楼。

这是一套以文史为主的大型的古籍名著今译丛书。考虑到普及的需要，考虑到读者的对象，就每一种名著而言，除个别是全译外，绝大多数是选译，即对从该名著中精选出来的部分予以译注。

译文力求准确、通畅，为广大读者打通文字关，以求能读懂报纸的人都能读懂它，我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中小学教师们的语文、历史教学的参考书，成为大专院校学生的课外读物，成为广大文史爱好者的良师益友。由于系统的古籍今译工作还刚刚起步，这套丛书定会有不少缺点、错误，也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巴蜀书社要我为这套丛书写序，我欣然接受了。我相信这套丛书不仅会使八十年代的人们受益，还将使子孙后代受益，它将对祖国的繁荣昌盛起到点滴的作用。最后借此机会向曾给予我们支持、帮助的专家学者和巴蜀书社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殷切地希望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我们一同做好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再放异彩而努力！

周 林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北京

前 言

《后汉书》一百二十卷，是纪传体东汉史。本纪十卷，列传八十卷，南朝宋范曄撰；志三十卷，晋司马彪撰。

范曄(公元398—445年)，字蔚宗，顺阳(今湖北光化，一说今河南淅川)人。他的家庭世代为官，祖父范宁，为晋豫章太守；父亲范泰，任晋御史中丞，南朝宋侍中。范曄从小就很好学，博览经史群书，善写文章，工于隶书，又通晓音律。因出继给堂伯范弘之为子，袭封武兴县侯。他十七岁以后，走上仕途，任过彭城王刘义康的参军，几次升迁，官至尚书吏部郎。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因事触怒刘义康，被外放为宣城太守。后来又几次升迁，官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元嘉二十二年

（445年）因被人控告参与密谋拥护刘义康做皇帝，于是以谋反的罪名被处死，时年四十八岁。

范曄多才多艺，但他成就最大的是史学。他在任宣城太守时，政治上不得志，便转而发奋从事《后汉书》的撰写。当时上距后汉虽已二百多年，但是可供参稽的后汉史料尚多，根据清代学者王先谦《后汉书集解述略》里的考证，范曄可能得见的后汉史书，除属于官史性质的《东观汉记》外，私人编撰有三国吴谢承的《后汉书》，晋薛莹的《后汉记》，晋司马彪的《续汉书》，晋华峤的《后汉书》，晋谢沈的《后汉书》，晋张莹的《后汉南记》，晋袁山松的《后汉书》等十八家。范曄对这些丰富的史料博观约取，加上剪裁熔铸，系统化条理化，写成后汉纪传。就其书中内容而言，多根据班固等人著的《东观汉记》及华峤的《后汉书》，此外对其他各家后汉书也颇有采择。由于他能够撷取众家之长，所以各家关于后汉的史书后来逐渐被淘汰，而他的《后汉书》却作为“正史”流传下来，并且跟《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四史”。本来范曄还打算撰写各志，但因为 他死得早，未能如愿。到南朝梁时，刘昭取司马彪《续汉书》的八志三十卷，加以注释增补，附在范书之后，以相配合。但当时纪传仍往往单独流传。直到

北宋，才将范书和司马彪《续汉书》的八志重新校勘，合刻成今本《后汉书》。

范曄撰写的纪传，有许多特点。其一是史料赅详，取舍得当。南朝梁刘昭在《后汉书注补志序》中认为范曄之作，比原有各家《后汉书》都要好。唐代的刘知几称许范书“简而且周，疏而不漏”，并说他在取舍方面“颇有奇工”。过去治史的人也都有同样的赞许。由于除袁宏的《后汉纪》之外，其他各家著述先后都亡佚了，这样《后汉书》便成为后汉史料的宝库。我们综观《后汉书》，其保留汉代有价值的论著就不少。如《崔寔传》里的《政论》一篇；《桓谭传》里的《陈政事疏》一疏；《冯衍传》里载其《说廉丹》一书和《说鲍宣》一书；《王符传》里记载的《潜夫论》中的五篇；《仲长统传》载其《乐志论》及《昌言》二篇；《张衡传》中有《客问》一篇、《上疏陈事》一篇、《请禁图讖》一篇；《蔡邕传》载其《释海》一篇、《条陈所宜行者七事》。这些短篇论著，都是研究后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珍贵材料，若不是范曄在各传中录载，恐怕后人是不可得而读之的。

其二是在编写体例方面有所创新。在范曄以前，列传中已有了以类相从的类传，如司马迁所撰

《史记》里的《儒林传》等，范曄在过去已有的类传体例的基础上，能根据后汉社会的实际情况，创设了《党锢》、《宦者》、《文苑》、《独行》、《逸民》、《方术》、《列女》六种列传。有了这些列传，就更加深刻地反映出了后汉纷繁的社会历史现象，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如《党锢》、《独行》、《逸民》等传，对那些尚气节重操守的人物，叙述其行事的倜傥、言论的豪壮，即使今天读起来还是铿锵作响。《列女传》表彰卓越女子的聪颖才智，嘉言懿行，读之能体察范曄为妇女立传的深旨。虽然，范曄在传文中褒扬的气节贞行，都不过是为了提倡封建道德风范，欲使人们读之后仰首钦羨而受到深刻的感染，对于范曄刻意宣扬的伦常观念，在今天看来，并不都值得我们效法。但是，他所记述的这些内容，毕竟是当时社会情状的写照，而且只要我们对它加以批判分析，也不无借鉴的价值。

其三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大体能够做到“立论持平，褒贬允当”。特别是与《三国志》相比较，显得格外突出，如记“曹操自为丞相”，“曹操自进为王”等，凡是陈寿在《三国志》中有所回护避讳的事，范曄《后汉书》大都改正，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这种做法，曾受到章太炎先生的称赞，说

“《史》、《汉》之后，首推《后汉书》。”（《略论读史之法》）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也肯定说：“范蔚宗于《三国志》方行之时，独不从其例……此史家正法也。”今天看来，作者在撰写《后汉书》时，与东汉的历史人物已无直接利害关系，是其能正确记述史实和公允评价人物的客观原因；不过，他的良史品格，也应是不可忽视的主观因素。

其四是擅长文辞表述，笔势纵放而娓娓动人。例如这部书的传记，在人物形象的刻划上就很成功。如写外戚贵戚梁冀的专横、贪赃，都用了犀利的笔触；写臧洪意气慷慨，激动人心；此外象写冯异、陈蕃、蔡文姬、乐羊子妻等，都有壮采奇情。因此《后汉书》中不乏杰出的历史散文。范曄对自己的撰述很重视，认为其序论超迈了前代史家，他在狱中给甥侄写的一封信中说道：“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论》。”这也并非不实的自诩之辞，在《王充传论》、《党锢列传》等序论里都是有所体现的。从实际情况而言，其序论的中心思想是颂扬风节，这自然是出自对后汉史事及人物评价的需要，也是范曄所处时代的教化使然的。范曄自认为是佳作，是合乎情理的。至于整理排比史料，创制

新编，他确乎表现了非凡的才能。因此对于范曄自视甚高这一点，我们不能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

当然，在肯定范曄《后汉书》的同时，也应该指出它的不足之处。就史学思想而言，他毕竟不可能超越自己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例如，他尽管对东汉末年的腐朽政治有所揭露和讽刺，但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劝谏封建统治者，维护封建统治。而对黄巾起义军则斥为“盗贼”，甚至连一篇传记都未列，这和司马迁《史记》把陈胜列在“世家”相比，就显得逊色多了。就体例而言，由于范曄死得早，原计划撰写的十志没有完成，也是此书的一个缺憾。另外，范曄作史，主张“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他说“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这种思想和方法本应是无可厚非、甚至值得提倡的。但是因为他完全是以世家豪族的政治标准来权衡人物，所以不可避免地打上他那个阶级的烙印。加上书中过分注意文辞修饰，对如实反映历史真相也带来了相当损害，并给读者带来了一些阅读上的困难。

《后汉书》纪传部分的注，最著名、最通行的是唐高宗之子李贤组织张大安、刘纳言等人所作。志的部分是南朝梁刘昭注。李贤注主要诠释字句，刘昭注侧重说明或补订史实。清代学者惠栋有《后汉书补注》，沈钦韩有《后汉书疏证》，钱大昭有

《后汉书辨疑》，周寿昌有《后汉书注补正》等。王先谦又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博采前人的成果，撰成《后汉书集解》。这些考证和注解，是研究《后汉书》和东汉历史的重要辅助材料。

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编印的《后汉书及注释综合引得》，中华书局出版的《后汉书人名索引》等，都是研读《后汉书》的重要工具书。

我们这个选译本，篇目参考了郑天挺主编的《中国史学名著选》中的《后汉书选》（束世澂编注），正文则参照中华书局1965年出版的校点本《后汉书》，部分篇章略有删节。注解和译文除参考李贤等旧注外，还汲取了今人各种《后汉书》选注本中的精言要义，限于体例，不能详为列举，敬希鉴谅。限于我们的水平，译文注释一定有错误和不准之处，敬请学者们批评指正。

选 译 者

一九八七年五月



目 录

前言	1
光武皇帝本纪	1
献帝伏皇后纪	89
刘玄传	95
冯异传	116
杜诗传	141
梁冀传	151
郑玄传	175
班固传	190
王充传	202
仲长统传	206

张衡传	239
陈蕃传	258
张俭传	281
董卓传	287
张鲁传	308
王景传	313
阳球传	321
宦者列传序	330
蔡伦传	339
单超等传	343
许慎传	352
逸民列传序	354
严光传	359
曹世叔妻传	364
乐羊子妻传	369

光武皇帝本纪

刘秀（公元前6年—公元57年），字文叔，南阳蔡阳人，汉高祖刘邦九世孙，东汉王朝的创立者，史称汉光武帝。

公元二十三年，刘秀和长兄刘縯（yīn引）起兵反抗王莽，后加入绿林军。在著名的“昆阳之战”中，刘秀立了大功。以后刘秀吞并铜马军几十万人，势力开始强大。公元二十五年元月，他登帝位，定都洛阳，建立东汉王朝。

公元三十六年，刘秀统一全国，刘秀在执政时采取了“退功臣而进文吏”的政策，实施了一系列发展经济和稳定社会秩序的措施。这些都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同时他对一些豪强地主妥协退让过多，这给后世留下了巨大的祸根。